

先

秦

兩

漢

先秦兩漢



文学流变研究

郭令原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Xianqin Lianghan Wenxue Liubian Yanjiu



先

秦

兩

漢

先秦兩漢



文学流变研究

郭令原 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先秦两汉文学流变研究 / 郭令原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2

ISBN 978 - 7 - 5004 - 7595 - 8

I. 先… II. 郭… III. ①古典文学 - 文学研究 - 中国 - 先秦时代②古典文学 - 文学研究 - 中国 - 两汉时代 (前 202 ~ 220) IV. I206.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22466 号

责任编辑 曲弘梅
责任校对 修广平
封面设计 弓禾碧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0 插 页 2
字 数 258 千字
定 价 2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赵逵夫

前人论治学，多主张“厚积薄发”。此虽只四字，做起来实难。“厚积厚发”固然好，但传统学科的古典典籍浩如烟海，有的人一生手不释卷，还说不少书未读。所以要做到“厚积”并非易事。如果学识方面积累并不多，而抱着只要读了书就要写东西，不然就好像吃了亏那样的想法，总是不太合适的。尤其高校教师，一面教课一面进行学术研究，要写很多东西，无论如何是困难的。所以我主张从事传统文化研究的青年同志，先应下工夫读书，思考、研究一些问题，使自己不断走向学术前沿，然后再着力完成对有关问题深入研究的论文与专著。当然，现在高校的评价机制也是问题，工资、津贴、住房等都同职称挂钩，而职称又同发表的论文、出版的专著挂钩，所以大家都不能不“快出成果”，多发论文，多编书。于是乎，在学术界普遍形成“薄积厚发”的状况，书还没有读完，甚至有的字也不认识，有关论文已一篇篇发表。前人早就解决了的问题，有的人还在那里喋喋不休，以为新见而反复申说之；前人已有很完善的解答，有的人还在边缘摸索，却以为找到了揭开奥秘的门道。这样做的结果，不仅做了大量的重复劳动，也产生了大量的文化垃圾，让这些文化垃圾堵塞了信息交流的通道，也造成人们认识上的混乱。事实上，一个人在学术上的贡献不在于所写东西的多少，而在于其成果是不是有学术价值。先师郭君重（晋稀）先生曾经说，他的老师曾星笠（运乾）先生生前发表的论文很少，没有出版过书，但讲音韵学的没有不提到他的。因郭师此语，我曾专门查找曾先生

论文读之。他生前共发表论文 11 篇，最早的为刊于《东北大学周刊》1926 年第 9 期上的《声学五书叙》，一篇三千多字的论文，全用古双声之字写成，由此即可看出星笠先生当时对古声已熟悉到何种程度。然而此前，他竟未发表过一篇有关古声、古韵的论文。第二篇《切韵五声五十一纽考》、第三篇《喻母古读考》（分别刊于《东北大学周刊》1927 年第 1 期、第 2 期），是在古声纽和先秦古韵方面开创性的研究，是声韵学研究上的重要贡献^①。他的《尚书正读》是 20 世纪 60 年代初由杨伯峻先生同徐湜先生整理出版的，已在他逝世十多年之后；其《音韵学讲义》是由郭师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整理，至 1996 年才出版（中华书局）。又《毛诗说》一书是他逝世后由学生据其在书上的眉批和讲课笔记所整理，后由周秉钧先生校理予以出版（岳麓书社 1990 年）。这些著作都是学者们十分看重的。郭师的另一位恩师杨遇夫（树达）先生一生著作宏富，涉及面也很宽，但像这样的国学大师那是极少见的，而且是由各种条件聚合的结果，差不多可以作为例外。君重先生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运动不断、教学任务繁重的情况下，也一直恪守“厚积薄发”的原则，发表论文总共十多篇。有的还是受命而作。但如《〈诗·鹊巢〉今说》（《争鸣》1957 年第 1 期）联系《诗经》有关篇阐释诗意，论证严密，一扫两千多年来的迷雾，使诗旨大明，从中已看出他后来所提出“组诗说”的思想；《邪母古读考》（《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64 年第 4 期）以大量例证证明邪母古读定母，使成定

^① 曾运乾先生的另外 8 篇论文是：《六书释例》，刊《东北大学周刊》1929 年第 71、72 期；《说文转注释例》，刊《中山大学文学院专刊》第 2 期；《论双声叠韵与文学》，刊《文学杂志》（广州）1933 年第 1 期；《客方言跋》，刊《文学杂志》（广州）1933 年第 2 期；同朱希祖的《审查客方言报告书》，刊《中山大学文史学研究所日刊》第 1 卷第 4 期（1933）；《读教士英关于研究古音的一个商榷》，刊《学衡》第 77 期（1932）；《广韵部目原本陆法言切韵证》，刊《语言文学专刊》第 1 卷第 1 期（1936）；《等韵门法驳议》，刊《语言文学专刊》第 1 卷第 2 期（1936）。

献，在古声学研究上是一个贡献。其《论杜甫〈秦州杂诗二十首〉》、《再论杜甫〈秦州杂诗二十首〉》（《甘肃日报》1961年12月1日、1962年4月7日）为甘肃古代文学研究开拓了新领域；其《试探“文骨”和“树骨”在〈文心雕龙〉中的重要意义》（《光明日报》1962年3月25日）对《文心雕龙》一书中两个重要的概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是古代文论范畴研究的成功范例。他的《文心雕龙译注十八篇》1963年8月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后，香港建文书局、中流出版公司先后翻印，流播至港台及日本、东南亚。郭师的绝大部分论著都是在65岁以后发表、出版的。他关于《文心雕龙》研究的系列论文之第一篇《〈文心雕龙〉的卷数和篇次》于《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刊出后，在海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台湾师范大学李曰刚教授的《文心雕龙斟论》（1982年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出版）在台湾影响甚大，而据山东大学牟世金先生研究、对照，该书关于《文心雕龙》篇次的调整，主要是依据郭师之说增益而成，而其所增益部分，尚难成立。牟书并对此列表加以对照^①。由此可以看出郭师在学术上的创新精神。因为此前的《文心雕龙》研究者如黄侃、范文澜、刘永济、王利器等大家都未提出过篇次问题。郭师关于《诗经》研究系列论文之第一篇《风诗蠡测》在《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刊出后，赵沛霖先生的《诗经研究反思》举20世纪初以来《诗经》研究的重要论文四十余篇，即收入此篇，摘要加以评介。他1982年出版了《文心雕龙注译》，1993年出版了《剪韭轩述学》、《诗经蠡测》（皆甘肃人民出版社）、《声类疏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了《白话文心雕龙》、《白话二十四诗品》（皆岳麓书社）。可以说，65岁以后他才进入收获的季节。屈原的《抽思》一诗中说：“孰无施而

^① 牟世金：《台湾文心雕龙研究鸟瞰》，山东大学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版，第100—102页。

有报兮，孰不实而有获？”先生几十年中牺牲了人生的乐趣，在好几个领域的探索上付出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这便是“施”；他在古代文论、古代文学、古音韵研究上取得的卓越成就，便是对他的回报。他几十年中手不释卷，伏案读书、思考、研究，使自己在不少方面超过前人，便是他在学术上的开花结实；他那些沉甸甸的论著，便是他的收获。所以，我觉得君重先生是“厚积薄发”的典型，是我们后起学者应该学习的，不仅要了解他在一些学术问题上的看法，还要学习他的治学方法和严谨的学风，也尽量做到厚积薄发，力争在学术上有所贡献。不用说，这当中最重要的是“厚积”，“薄发”主要体现着一种严谨的治学态度。

郭师的公子令原1982年毕业于西北师院（今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由于家学的原因，本科阶段成绩就很优秀。我到郭师处去请教问题，常看到他在读书。有一次我看到读的是朱熹的《诗经集传》。似乎现在的大学本科生阅读古书，很少有读清代以前旧注者，而且读完整部原典的也很少。令原毕业后留校任教，一直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至今已26年时间，古代文学的课程，他从先秦到明清都教过，则专业方面知识之宽，可以想见。一方面由于教学任务繁重，另一方面他也恪守“厚积薄发”的治学准则，二十多年来读书多，而发表东西较少。但就其所发表者言之，都言之有物，实事求是，总有自己的心得，不是做重复劳动或故弄玄虚，将别人的看法换一种说法，贴上另外的标签作为新说哗众取宠。他还参加了我主持的三个大的科研项目：一个是教育部项目《唐前诗赋关系探微》，他承担了东汉部分诗赋关系研究，先后写出五节。对其中一些问题我们曾多次一起讨论，我觉得他在汉代文学方面掌握很扎实，其中一些论述也深入而有新意。第二个是我从1992年即开始组织本校教师编著的《历代赋评注》，他参加了汉代卷的评注工作。第三个是他参加了“西北师大科技创新工程项目”《先秦文论全篇要论》的工作，承担《周礼》、《仪礼》、《晏子春秋》等书中有关文论、文

学思想材料的辑录、注释，后又协助我做了一些统稿工作。另外，在我联系《历代赋评注》的当中接触到三秦出版社谈懿诚先生，《历代赋评注》的出版最后因故未能成功，但他约我为该社出版的《名家评注古典文学丛书》编选一本《汉魏六朝赋评注》。令原与刘志伟在我们十多年前一起编的《汉魏六朝赋选粹》（本为约稿，因故未出版）的基础上修改完成之。以上这四部书大体都可能在一两年内出版。只从这些方面来说，令原在科研方面所做的工作也是不少的。

令原在郭师影响下勤奋读书，有很好的基础。20世纪90年代从我论学，取得硕士学位。2000年，他又考为我的博士生，同池万兴、徐正英、黄伟龙一起入学，研究方向为先秦文学与文论。我认为要深刻理解古代文学思想的内涵、体系与它的形成过程，要认识古代文学的框架及其与其他学科理论的关系，要准确把握古代文学批评的含义和针对性，必须弄清古代文学理论的一些基本范畴，弄清它的内涵、外延与它作为文学理论范畴的形成过程。这样，我们才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民族特征，而不是牵强地将一些词语同西方的文学理论概念对应，或以今日对一些文学理论概念的解释去理解古代的文学思想，也不至于按我们今日之理解去设想古代文学理论的体系，去阐发古代文学批评的动机与含义。因为范畴是人的思想对客观事物本质的概括的反映，从古代文学理论来说，它既是古人关于文学载体的认识，也是建成当时文学理论的基本构件，是进行文学批评的工具和标尺；他们之间的关系，反映着当时文学理论的体系。而后代文学理论中很多范畴也是由先秦时代的范畴发展演变而来的。要真正准确把握中国古代文论的基本范畴及人们在理解运用中的歧异，不能不追溯至先秦，弄清它初始时的意义，然后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哲学、美学思想和与文学相关学科的发展，去认识它演变的轨迹。当时王运熙先生、黄霖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出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赠我一部，第一卷

《原人论》论中国文论的原理，第二卷《范畴论》，第三卷《方法论》。第二卷由汪涌豪先生著，汪先生又另外寄赠我一本《范畴论》。汪涌豪先生这部书全面考察了文学范畴的构成范式、主要特征、基本类型、逻辑体系及其与创作风尚、文学体制的关系等问题。这部书为各个时代一些具体范畴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所以我建议令原以先秦时代的文论范畴研究为学位论文的选题。其间我曾同他就其中一些问题多次交换看法，也向他提出过一些应该认真研究的文论范畴。2003年他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先秦时代几个重要文论范畴的研究》。时当非典肆虐，答辩未请外地专家，但请省外有关专家评审，专家们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有的专家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当然，要达到对先秦文论中的范畴有一个全面而确定的看法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首先，哪一些算文论范畴，哪一些不算，要根据整个先秦时代这些范畴、概念的运用场合、使用范围、各家的理解等的全面研究来确定，而要搞清楚这些，仅仅读了有关典籍不成，还有一个融会贯通及相互比较的问题。至于联系以后的使用情况，以之为参考上溯其意义的起点，也有一个对整个古代文学思想、文学理论基本概念的了解与熟悉的问题。所以，几年来令原对其中几部分认为意见比较成熟的修改发表，以向学界同仁请教，还有一些想继续进行研究。本来，他如果愿意，这部论文在他毕业一两年后即可出版，我几次征询他的意见，他都说还想再作些研究。由这里也可以看出令原对学术研究的严谨，这也正是我在前面所说的“厚积薄发”的精神。

去年年底，令原因为考虑到家庭生活的方便，调兰州交通大学中文系工作，也主动提出将他招的硕士生调给其他同志。他将博士论文中认为比较成熟的几篇，同其他有关论著汇为一集名曰《先秦两汉文学流变研究》，交付出版。因为书中绝大部分内容我都看过，有的不止看过一遍，有些内容甚至同他商讨过，故请我作序，因而由二十多年来对他所了解种种，联想到先师君重的治学精神写出以上的感想。

本书是从文学现象和文学思想两个方面探讨先秦两汉文学的发展情况。全书分为三编。

上编是“先秦文学思想论”。书中有的论文从文字训诂的角度考察了一些范畴的形成情况，如《论“象”的含义及其在先秦文学思想中的意义》一文探讨了“象”字本义与南越大兽，后由象舞演变为模仿、效法之义，较前人之说更为合理。论文注意相同理论范畴在不同时代、不同创作背景下的不同内涵，如《论钟嵘〈诗品〉对兴、比、赋的阐释》，特别指出钟嵘把原用于《诗经》的“赋比兴”理论范畴用到了五言诗的诗艺方面，对赋、比、兴的内涵的发展有着特别的贡献。这部分中的有些论述应该是属于开创性的研究，不乏作者的创见。

中编“《诗》《骚》论”，主要是他在读《诗经》、《楚辞》中产生的一些看法，分析细致，有其独到之处。如《〈鲁颂〉，颂僖公图复周公之业，争伯诸侯也》一文通过对史料的分析和对作品的考察，认为《鲁颂》的内容体现了鲁僖公争伯的历史情况，既指出《鲁颂》的文学价值，也补充了传世文献记载的不足。《论战国说辞与屈原赋》讨论了屈原作品在诗赋之间起到了重要的枢纽作用，涉及文学史上的一系列问题。诸子散文的文体变化并不如传统教科书中所说的进化观点，而是和百家争鸣的社会风气相一致，寓言比喻等在战国诸子散文中的大量出现，也同游说之风有关，实际上是一种语言策略。

下编“汉代诗赋流别论”是参加我所主持《唐前诗赋关系研究》项目所完成的部分，该项目是1993年1月教育部批准的，已完成十来年，但因为近些年我又在进行《全先秦诗》、《汉诗辑考》、《历代赋评注》的工作，打算在这些从作品入手、侧重于文献研究的工作结束之后，对这一部集中反映我们对唐前诗赋关系及其流变研究的著作再作一些修改，庶几不留下遗憾，因而未及时出版（早已同人民文学出版社签订出版合同）。这也是我力争在学术研究上做到深入、扎实的缘故。现在回头一想，恐怕过于拘谨。今

令原将此部分内容发表问世，听听学界的意见，也有利于我们进一步修改。本书中所收只是东汉时期诗赋关系的部分，但从中可以看出在相关问题上研究的深度（《唐前诗赋关系探微》也力争在今年后半年交稿）。

总的说来，本书的三部分都是深入研究之作。其中有的问题虽然比较具体，但关系到对先秦时代文学理论体系与先秦两汉文学发展规律的认识，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开阔的思路，可以说是“以小见大”。

令原在学术上积累了二十多年，《先秦两汉文学流变研究》是他的第一本书，是他厚积薄发的首出之作。他参加的《历代赋评注》（共七卷，令原参加“汉代卷”工作）今年将由巴蜀书社出版；《先秦文论全编要论》今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唐前诗赋关系探微》，2009年之前出版。只这些，也可以说他的丰收的季节已经开始了。

我因为从1992年5月开始任中文系主任，2000年开始任文学学院院长，直到2004年卸任，共12年时间；从1993年1月起任省人大常委，连任三届，共15年时间。加上其他方面会议等，占去了不少时间。尽管我将所有的假期、双休日、节假日、夜晚的时间都拿来弥补在这些方面失去的时间，但还是使很多事情不能集中精力、集中时间一气呵成，差不多很多研究工作都在进行中，却总是未能最后完结。2004年夏天以来，除非一些十分重要的会议之外，我很少外出。每年收到十多个全国的、国际的学术会议邀请函，有的明确说去机票及所有花费由会议承担，包括在国外召开的，及会议期间组织到朝鲜、韩国、越南等地考察的，我全婉言谢绝了。现总算是将几个大项目最后完成了，有的已交出版社。由于种种原因而使参加项目的未能及时看到自己成果的问世，是我感到十分抱歉的。这也是我这四年下来下决心不外出、不参加其他活动的一个原因。

我在科研的经历上，很多方面与令原有同感。高兴的是看到

令原的一些成果将由此书为开头而陆续问世。根据他二十多年勤奋学习、努力钻研的情况，相信他一定会有更多的成果陆续问世。

2008年4月13日

目 录

上编 先秦文学思想论

- 论先秦文论的研究方法 (3)
- 论先秦时期“志”的文学思想内涵 (20)
- 附 论曾皙言志
——读《论语·侍坐章》 (37)
- 论先秦时期“气”的文学思想内涵 (42)
- 论“象”的含义及其在先秦文学思想中的意义 (56)
- 论“和”与先秦文学思想 (71)
- 论“巧言”、“巧辞”和先秦文学思想 (85)
- 附 论钟嵘《诗品》对兴、比、赋的阐释 (101)

中编 《诗》《骚》论

- 《七月》新解 (117)
- 《鲁颂》，颂僖公图复周公之业，争伯诸侯也 (128)
- 宓妃考索
——兼论《离骚》中“求女”的比兴意义 (143)
- 《招魂》主题新证 (157)
- 论战国说辞与屈原赋 (171)

下编 汉代诗赋流别论

论东汉诗体的流变	(191)
论《诗经》对东汉赋的影响	(207)
论楚骚对东汉赋的影响	(227)
论汉代诗歌对东汉赋的影响	(252)
论汉赋对东汉诗歌发展的影响	(271)
后记	(302)

上 编

先秦文学思想论

论先秦文论的研究方法

一、先秦文论范畴研究的意义和问题

我国现代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是从西方嫁接过来的。虽然说西方的理论对近现代文学及其理论的发展曾起到了积极意义，但中国文学毕竟植根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中，是用汉语、汉字写成的。今天，一方面随着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其民族性特点日益受到重视；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再盲目照搬西方理论以代替自己的创造已不能适应时代的潮流。因而，重新认识中国古代文论，建构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理论和批评就显得格外重要了。汪涌豪先生说：“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劳作，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终于找到了一个新的突破口，那就是对传统文学理论批评所用的术语、概念的针对性研究，对传统文学理论批评范畴及其系统的研究。”^[1]这是很有见地的，虽然研究古代文论的方法可以多种多样，角度也可是多方位多侧面的，但范畴的研究把注意力放在理论思维的构成上面，可以更为准确地抓住一种理论的基本特征。具体一点来说，范畴研究的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语言是思维的载体，人类思维活动过程是对客观事物由个别到一般，由具体到抽象的认识过程，而这种认识是需要用语言固定下来的；同时，思维在对事物的推理判断过程中，需要对语词进行分析归纳，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范畴就是一种特殊的语词，它既体现着人类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和认知方式，同时也包含了丰富的人类思想内容。作为文学理论范畴的语词，必然是形成文学